

试析克莱斯特小说《智利地震》中的权力与时间

刘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30)

【摘要】《智利地震》是德国作家克莱斯特批判和抨击教会势力的一篇杰作，而权力与时间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两个重要主题。作者在小说中展现了时间在构建社会现实时起到的媒介作用以及统治权力和民众暴力之间平等和对立的矛盾关系。

【关键词】智利地震；权力；时间

德国著名作家克莱斯特的小说在内容上密切结合现实，反映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富有现实的批判精神，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支柱即大贵族、大地主和教会势力。尤其对后者的揭露、抨击更是无情和入木三分。在这方面，《智利地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脍炙人口的杰作。《智利地震》以发生在1647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那场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贫寒家庭教师赫罗尼莫和贵族女荷赛发相爱诞下私生子，被教会判处死刑。一场地震打断了刑罚的执行，灾难让人们心怀慈悲相互和解，然而教会把灾难归责于这对恋人对“上帝”的忤逆，最终他们被愤怒的暴民杀害。

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而权力和时间是贯穿其中的两个重要主题。克莱斯特全面地分析了时间在构建社会现实时起到的媒介作用：一方面，他的文字围绕斗争和暴力场景中时间的紧迫；另一方面，他的文章涉及制度权力的时间，即在有组织和有结构的时间框架内展现的权力影响。例如，不仅在现代国家，法律基于其越来越合法化的程序需要时间，而且在确定身份或重构过去发生的事实时也需要时间。

当下的诉求和由执行程序带来的延迟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卢曼所说的“时间问题”，它出现在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日益分崩离析的复杂社会中。“在某种程度上，体制开始将自己定位于不受时间的影响，即开始导向功能性的目的。”翻译成权力社会学的术语就是——这个时间问题表现为群众无约束的自发暴力与政府机构的程序权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经常可以在克莱斯特的作品里看到这两个主题：通过暴力剥夺时间构建的现实交流和由时间构建的权力。一方面，他讲述了在宪法制度之外，暴力如何剥夺时间，以及现实的架构过程如何屈服于瞬间。另一方面，也讲述了在制度背景下，权力及其程序如何为现实而战。然而，不仅在给与的时间内，即使在极端时间限制下都会发生交流。

1 《智利地震》突显了机构统治与自发暴力之间平等和对立的矛盾关系

一方面，政府和教会机构的权力基于人民在法律意义上的话语平等。它依赖于民众一定程度上的赞同，并从自身具有的潜在暴力中获取法律效力。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介入和控制这种潜在的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因此，法律权力对非法暴力行为表面上要打击，实质达成潜在一致。

政府和教会在执法时虽然欢迎并需要人民的赞同和拥护，但他们在对抗人民的愤怒时却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在故事中，克莱斯特仅用短短20几行文字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因素的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不顾荷赛发即将临盆的处境，立即把这个女罪人送进监狱，而且还不等她出月子，大主教就要对她进行最严厉的审判”。以火刑处死而告终的教会“最严厉的审判”正好对应着人群予以的谴责，攻击修道院的尖锐语言。即使是阿斯特隆家族

（代表着贵族和金钱的权力）以及女修道院长（代表着修道院的权力）的请求和希望也无法减轻事件引起的轰动和愤怒，这里还强化了教会教规的地位：“一切办法都想尽了，才不过是在总督的干预下把她原本被判的火刑改判成了斩首，可这仍然使得圣地亚哥城中的太太小姐们十分气愤”。总督以其减轻了教会严厉惩罚的改判触碰到了他的权力底线，对他来说，权力受到制约与其说是法律的影响，不如说是源于民众的愤慨。

正因为总督的减刑遭受到了如此大的愤怒，小说紧接着叙述了在行刑队伍去刑场途中民众的过度窥视，把这作为对没有执行火刑的一种弥补。“显然，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它存在的权利，即使它将来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人们一如既往表现出来的潜在暴力现在通过教会安排的时间信号（也就是钟声）被机构的权力组织起来并服从于它。这种制度权力与民众力量的艰难关系始终是近代早期刑罚实践中的关键点，也是这里的主题：“统治者要求民众屈从于他的权力，他可以在短期内忍受他们的暴力，这种暴力被他视作臣服的象征，但他又会将这种暴力视作是对自己特权的限制而予以镇压。”暴徒总是潜伏在惩罚仪式的背后，因此，惩罚仪式必须击败民众的暴力，用为观众提供一场完美的表演来平息大家的愤怒。每一个惩罚过程中的不当举措都会激起人群的暴力沸腾，并挣脱仪式的束缚。因此，一方面，惩罚仪式与暴力能量一起发挥作用，惩罚仪式通过暴力惩罚犯人的身体；但另一方面，在暴力存在并被利用的过程中，又必须受到控制和制约。

游行是国家和教会权力都会使用的一种遏制暴力的手段。无论是世俗的行刑游行还是教会的圣体节游行，都兼具了工具和表达的功能：它既服务于执法的目的，稳定社会的权力秩序，同时又约束和安抚了参与者和观众。在制度权力（以及保证的时间）和非制度暴力（以及剥夺的时间）并存和对立的权力社会学背景下，《智利地震》正好反映了这种权力和暴力的关系。这在一系列有组织的权力游行中得以体现，被暴力中断的游行又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新的游行。分娩的自然力量打断了圣体节游行，才有了之后的行刑游行，而行刑游行又被地震的威力再次打断。教堂里，私刑暴民“打断”了修道院教士滔滔不绝地讲道。

故事中的“中断”——分娩、地震、私刑暴徒在主题上相互关联：正如荷赛发在圣体节游行期间因为临产前的阵痛倒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一样，地震的威力同样也引发了“满街的女人都一个个竟当着男人们的面分娩起小孩来”。就像无辜的人在地震中因为仓促和混乱逃命而被绑起来一样，最终发生在教堂里的惨剧，同样由于仓促和混乱，同样针对无辜的人。

和“中断”一样，故事中的“游行”在主题和功能上也相互关联。游行通过在观众面前展示秩序、等级和地位来展

示身份。因此，游行与社会交际有关，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交际。在圣体节游行中，新人跟随修女，以便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和记住她们的位置。这点对行刑队伍的秩序同样适用，犯人的位置被暴露在观众眼前。唐·费尔南多想以尊严和社会特权来缓解和制止教堂内受到煽动的游行群众有威胁性的暴力爆发：“他借来海军军官的佩剑，让荷赛发挽着自己的胳膊一起往外走，要求落在后面的一对儿赶快跟上。看着这种架势，人们自然畏惧三分，便闪开道，让他们走出教堂。他们呢，也自以为已经得救了。”

唐·费尔南多在这里凭借缓慢的行为来展现他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

2 地震作为故事的主要“中断”和中心事件以极端的方式摧毁了社会时间，即社会连续性的历史，也粉碎了由这种社会连续性产生的身份

通过所有权力机构——修道院、大教堂、总督的宫殿、法院、父亲的房子、监狱——被毁灭前后的对比创建了一个权力交流的天堂：超越社会时间、历史和身份的有限时间。这种权力交流被纯粹的“当下”和由此出现的一个“好像”和解的幸存家庭所取代。

地震后，人们的相聚不再由任何社会通用的经验或等级来组织，而是由随机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组成。山谷中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不再有一个情境框架可以提前知晓参与者的身份，调整参与者的关系。人们是否会遇到自己认识的人，或遇到认识自己的人，以及后果会是什么都不得而知。地震不仅动摇了权力机构，同时也动摇了与身份有关的社会分配和等级划分。荷赛发与唐·费尔南多的相遇以及克莱斯特在句中使用的破折号反映了这一点：“荷赛发认出他是一个熟人，神色有些慌乱；对方理解错了，继续说：‘只需喂一会儿工夫，唐娜·荷赛发，这孩子自大伙儿遭到不幸天灾的那一时刻起，就啥也没吃过。’荷赛发于是道：‘我没有立即答应——那是另有原因的，唐·费尔南多；在这样可怕的时刻，谁也不会拒绝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的。’”

这个场景描述了荷赛发自地震以来与市民代表的第一次碰面，那些市民曾租用了行刑队伍要经过的沿街窗户和房顶想来见证处决时的景象。尽管文中没有提到唐·费尔南多是否也坐在那里，但无论如何，荷赛发现在遇到一个熟人确实可能会让她感到慌乱，因为对于费尔南多来说，她昨天还是被判处死刑的罪魁祸首，但他现在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费尔南多对这种慌乱的反应不仅揭示了他对这种慌乱的错误理解，而且还揭示了他的正确理解。因为当唐·费尔南多将地震描述为“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的时刻（他知道这意味着将荷赛发从死刑中解救出来）时，他是在传递一个信息：自己已经忽略掉地震前的那段时间，让她融入到因地震而不幸的人们组成的“现在-我们-这里”集体中。荷赛发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意识到了这个提议。她现在直呼唐·费尔南多的名字，回应说“在这样可怕的时刻”，“没有人”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请求。荷赛发对于费尔南多社群化的表述“每个人都是不幸的”的回应是同样社群化的“没有人会拒绝”。破折号掩盖了荷赛发决定接受费尔南多的提议，并将沉默的“其他原因”当做未说出口的原因。

在这个场景中，当交流发生在以社会作为联系的情境及其被赋予的身份归属之外时，了解自己如何会陷入困境变得很清楚。费尔南多虽然是熟人，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似乎并不认识荷赛发，至少不认识昨天被定罪的那个“罪人”。超越权力话语设定的交流空间能够实现并加强对情境和身份的

特定建构。作为沟通特征的双重偶然性随着解决沟通问题的惯用机制（对情境定义事先达成的共识限制了自我和年龄改变的各自期待）的失效而愈发明显。根据卢曼的说法，这种解决策略的功能等价物是“时间维度”，尤其是对于仍不清楚的情况，这正是克莱斯特以慢动作展现的：克莱斯特的叙事技巧将一个复杂时刻的接连举动（慌乱的神情、犹豫和沉默）分解成几分之一秒的因果联系，这让我们可以观察到双重偶然性问题在此时是如何被解决的。这意味着：像乌托邦式“和解”的现实是如何被临时创建出来，并作为进一步交流的规则。建立“现实”的特定交流的冲动最初表现为自由，即不考虑世俗中的身份。当下的交流，即超越社会时间，却具有故事中间部分情节规则或约束的特性：和解是由于不可避免的记忆障碍，同时，它也是冻结的记忆本身，是禁止回忆的基础。“仿佛大家受到那地震的可怕打击以后，所有人的心肠都变软了。他们回忆的思路就只能到此为止，再往前就什么都已淡忘。”这是一个和解的悖论——没有对和解前历史的回忆，而这一点又是和解必然触及到的。

之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被切断了，直到地震发生时还有效运作着的一切都被掩埋了。这可以从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看出，叙述者讲述了一系列在地震中发生的看似无关的事情和人们的反应，再次让大家回忆起了秩序的崩塌和时间的终结：“人们讲，城里在发生第一次大震后突然满街都是女人，一个个竟当着男人们的面分婉起小孩来；教士们则擎着十字架在城里四处乱窜，口里高喊着：‘世界末日到啦！世界末日到啦！’一队卫兵奉总督之命要求空出座教堂，有人却回答他们：智利已不再有什么总督！在恐怖大到极点的时刻，总督不得不下令竖起一些绞架，以制止趁火打劫的现象蔓延；这样，一个无辜的人为逃命而穿过一所正在燃烧的住宅的后院，就被房主不分青红皂白给逮了起来，立刻套上绞索。”

在这一系列交叉且内容矛盾的叙述中，荒谬和反常的叙述没有被制止。相反，诗人梦中的山谷似乎是一个交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对极端状态和最终状态、过度、颠倒和暴行的讲述所激发起的震惊和憧憬被同时展现、维持甚至更新。在讲述中的开头和结尾两个事件宣称了极端逆转的事实（公开分婉；处决无辜的人），中间引用的两句叫喊声（世界末日到啦！智利已不再有什么总督！）指向尘世间权力表演性的终结。

当山谷里讲述教士们如何尖叫着在城里四处乱窜并高喊“世界末日”，然后是修道院里恐慌和歇斯底里的表达的引用和重复。讲述以引用的方式重复并延续他们所说的情景。叙述中引用的以及叙述者本人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这两种言语行为同时用直接引语再现——世界末日到啦！智利已不再有什么总督！——这种论断式的表达是他们陈述的现实，同时也是表演性的表达。当用论断来回应以统治者名义下达的指令，他不再存在，在那一刻他不再存在，不管他的“真实”存在。通过在叙述中引用这些关于世界末日和总督末日的陈述句，它们又同时再次使用——在讲述和倾听的那一刻——宣布世界末日，否认总督的存在。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引用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以及这些妇女是否真的在男人面前生育与当下的叙述功能无关。而当讲述到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匆忙逃命而被抓住并立即绞死时，这就是在重复并唤起事实。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叙述——就它们在山谷中的作用而言——完全停留在地震和由此引发的创伤的魔力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话语的余震，并与真正的余震同时发生。通过地震魔力下的叙述将这个魔力传递给听众，并对其产生影

响：对震后情形的描述使人不可能超越现在。

这段话也可以从文本层面进行分析，即分析小说的内部文本交流或叙事话语。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如何微妙地延续，还可以看到地震前的事件如何被谈论（荷赛发在众人面前分冤），这些叙述和事件同时提前发生，促成了教会的终结：谈论世界末日的的话语对那些认为自己得救的无辜者仓促的私刑处死。尽管在叙事话语的层面上提到了开始和结束，但至关重要，在山谷中讲述地震发生后情形并不是叙述连贯的解释，而只是对地震的间断性重复。山谷中的交流符合梦的结构或意识的结构，它不要求逻辑性和连贯性。因此，前一句是“智利已不再有总督”，而下一句是“总督下令架起绞刑架”。这导致了一个悖论：即在话语上对开头和结尾的预兆重复提及，在情节上却把人物留在当下，让他们盲目地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两种不同叙事层面之间的这种对立（叙事话语和历史）碰上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相似对立：荷赛发和赫罗尼莫一开始决定“以书面形式”向总督提出请求，但马上又作出相反的决定，他“将去跪在总督面前要求他”。对于世俗的权力还有“聪明的办法”，即对力量的判断，既考虑到空间距离，也考虑到面对权力的时间。他们决定“在离港口更远的地方再向总督提出书面请求，要是情况非常好，出现了所希望的变化，再回圣地亚哥来也挺容易”。然而，最终，荷赛发和赫罗尼莫成为了教堂中讲道和语言的受害者，这些讲道和语言正是遵循山谷中的叙述模式，构成了表演性的裁决和特定的现实。

3 故事的结尾

“随后，唐·费尔南多和唐娜·艾尔维莱将小菲利普收为养子；小菲利普呢也深得双亲的欢心，有时唐·费尔南多禁不住把他与小胡安相比较，竟几乎感到高兴呢。”会让人感到很困惑：唐·费尔南多在用荷赛发和赫罗尼莫的儿子代替自己的儿子时为什么好像很高兴呢？

如果我们在由权力、时间和现实构成的背景下去阅读小说，那么故事的结尾最初会失去一些分量。克莱斯特展开和叙述分析在不同表演模式（以及它们各自的时间性）下，交际现实的问题完全独立存在。人们也可以将其表述为——一个社会是否有可能同时既有历史，又没有历史；或者个人的异类历史如何转化为大众共同的历史。

事实上，教堂里的谋杀现场在交流结构和时间紧迫上类似于在山谷里的叙述，不仅破坏了诗人梦想的乌托邦，而且同时将小说开头的制度权力的影响与私刑暴徒进行了比较。如果将地震视为中断了死刑的执行，那么最终在另一个层面上还是完成了死刑，这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结构引起了两种死刑模式之间的比较。有四个死者的教堂场景带回到了故事开始：那时——如果没有地震，将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死者。

基于此，我们可以就国家权力和暴民统治的伦理评价进行比较：“政府和群众尽管对赫罗尼莫和荷赛发持相同态度，都要求他们死，但是在政府看来，这种行为至少是根据人类

法律证明是正确的行为，是经过合法程序得出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最疯狂的仇恨、野蛮的嗜血成性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的表达。”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与沃尔夫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必须有一个社会，那么[……]一个政府建构的社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可理喻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更可取，因为后者会如脱缰之马失去控制。”

我们还可以在分析权力的表演时进行比较。开始时制度权力以及其司法政治（言论-）行为和结尾时现实的表演特定设置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就是时间。在政府机构统治下，至少还有时间去执行法律程序。从结尾回到开始（只要在其他层面被中断的死刑继续执行）也适合去质疑这种差异。结尾时，教会不仅阐明了权力的表演性和暂时性，而且在制度统治及其程序面前，被视而不见和被掩盖。因为即使是符合制度程序做出的决定，即使他们为此花费了必要的时间并获得了必要的知识，仍然是决定的时刻——这一时刻仍然是紧迫和匆忙的有限时刻。正是在结尾中显现出如此明显的时间紧迫和过度紧张，没有与事态作明确划分，而是事态本身所固有的。

无论在比较中如何强调或解构差异，比较文本本身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故事结尾，费尔南多在比较他的两个儿子和想到他获得这两个孩子的经过时，重现了唐娜·伊丽莎白梦幻般的眼神，这反过来也是对荷赛发现在和昨天状态的一种比较。就像在山谷中，唐娜·伊丽莎白能够超越当下，看着荷赛发，回忆起她的过去，反思现在和昨天的区别一样。费尔南多现在看着他的养子，同时回忆缺席者和在场者，并思考两者之间的差异。于是他不再是现在的英雄，而是被迫进入回忆模式，在将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中将两个孩子相互比较。至少这让人可以想象，这既是又不是的奇怪喜悦并不是指成功的“道德缓刑”，而是比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身，是从现在开始必要的对现在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 Vgl. Niklas 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M]. Frankfurt am Main, S. 150-226.
- [2] 杨武能译，《克莱斯特作品精选》[M]. 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13-126页.
- [3] Michel 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Übersetzt von Walter Seitter.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77.
- [4] Vgl. Hans M. Wolff: Heinrich von Kleist als politischer Dichter[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modern philology, Volume 27, No. 6, S. 343-344.

作者简介：

刘莎：1983年9月生，女，汉族，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德语教师，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